

粤派批评

特约主持人：龙扬志

主持人语：

受益于中西海道开辟和门户开放，岭南在近代中国思想、文化方面得风气之先，活力亦表现在美术和音乐等艺术领域，如岭南画派融合中西创作技法、书写地方风物反映时代面貌拓展中国画的表现空间，音乐界亦有从广东走向全国的萧友梅、冼星海，堪称现代音乐理论与创作的闪亮双星。本期刊出驰名全国的岭南学者、教育家和音乐家萧友梅先生的批评文辑，旨在呈现其在新音乐批评和中国音乐学科开创的关键作用。

DOI:10.16591/j.cnki.44-1332/i.2017.03.003

萧友梅音乐批评文选

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

自从1月26日晚，我们替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大学开过第一次国民音乐会之后，就有朋友来问我：“到底国民音乐会有什么价值？”本月17、18两天，一连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了两次，遇着熟人，还有许多想知道外国国民音乐会的情形和它的势力的。可见得近日社会上研究高尚艺术的人已经逐渐增加了，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。我想还有不认得我的，也许有同样的质问的。所以不如把我近日答复我朋友的话，分条写在下边，让一般听过和没听过国民音乐会的爱乐家，都知道外国国民音乐会的情形，也未尝不好。

一、国民音乐会的目的

不单是想给国民一种高尚的娱乐就算了事，还想

对于完全未学过音乐的借此可以引起他们学音乐的兴味；对于已经学过音乐的，常常给他们一个机会练习他们的听觉，这就是“温故知新”的用意。总之，一方面是想引起国民向美的嗜好，一方面是想音乐普及。

二、国民音乐会的办法

欧美的音乐会有好几种（国民音乐会之外，还有各种独奏的音乐会，几种合奏的音乐会，管弦大乐音乐会——Symphonic Concert），但是以国民音乐会票价最廉，因为它的目的是在于普及，想个个国民都可以来听，所以，国民音乐会的会场也特别大（譬如伦敦和德国莱蒲齐城的 Albert Hall，柏林动物园侧的 Bankettsaal 都可以坐六千人以上）。会场虽然可以容几千人，每月虽然有几次音乐会之多，但是我每次去听都觉得没有一个座位空着。奏乐的乐师都是极好的选手，指挥和独奏家也是在乐界数一数二的人物。至

于乐曲的内容，大概分开两种：第一种是比较浅近而高尚的小品；第二种是整套的大乐 (Symphonie)，这种乐曲 (大乐至少要半小时方可奏完) 虽然比较高深，但是还希望可以逐渐普及的。乐曲的作者并不限定是本国人，因为音乐是一种真正的世界语，我们听见一种没有学过的外国语，必定要请人翻译，但是奏起别国的音乐来，不用翻译亦可以明白这个乐曲的性质。所以音乐是世界的，是最能联络人类感情的。国民音乐会凡国民应听的音乐会。并不是专奏一国音乐的会，它们的秩序单都有记载作曲家的略传，关于乐曲的历史或组织亦有简单的说明；如有歌曲时，还把歌词印上。

三、国民音乐会的功用

国民音乐会的办法既然这样完备，自然可以发生强大的效力。从积极方面说起来，对于没学过音乐的人，可以引起他们学习音乐的兴味；对于音乐学生可以供给他们许多材料，譬如学技术的多听几回自然容易领会，学作曲的多听音乐会，一方面可以得许多的曲料，一方面可以认识许多节奏的形式，这种知识

比较从书本子里得来的还要确实。所以，音乐学生听音乐和画家的写生旅行一个样子，越听得多，所得的益处也越多 (我记得留学柏林的时候，在一个音乐季节——从9月底到次年4月中——内，最多听了二百零几个音乐会)。更进一步讲，国民音乐会就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。在吾国没有一所正当的音乐专门学校的时候，这种音乐会尤其要常开，因为不这样，社会上真会忘记有所谓“音乐教育”一件事，因为我国已经一千多年没有正当的音乐教育机关了。近日社会上所提倡的，还是偏重造型美术和戏剧两方面，所以我很盼望爱美的同志总要分一半精神来提倡音乐，方才可以讲提倡美育。若是单讲究静的美术，不讲究动的美术；单知道研究空间的美术，不知道研究实践的美术，那不能算完全的美术罢？以上是从积极一方面说。在消极一方面说起来，国民音乐会于国民道德上也很有些影响。现在我国国民溺于不正当嗜好者实在不少，假使每礼拜至少有一次大的国民音乐会，总可以把他们趋向于不良的嗜好减去一部分。一个家庭里头，如果有几个人爱音乐的，这个家庭就不

至有赌博之患；一个社会里头如果爱音乐的团体多，别样坏风俗自然就可以减少了。古语说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蔡子民先生和中华教育改进社诸君深知国民音乐会的价值，特意要我们乐友社帮他们忙，每月开若干次国民音乐会，从1月26日起到2月18日，先后已经开了三次。所得的效果如何，现在还不能说。不过单就这三次的经验而言，我觉得有两种很好的现象：第一，听众一次比一次多；第二，会场秩序一回比一回好（第三次演奏时，会场异常肃静，与在外国音乐会会场无异），足见听众有爱乐的真表示。但是同时发现有两种困难，我们不妨说一说：第一就是冬天在北京很不容易借得一个不要租钱、宽敞而温暖的会场；第二就是市内没有电车，交通不便令许多爱乐者因此牺牲了这种机会。所以我很希望北京有宽敞的会场，最好想法子改良会场的设备，把温度提高一下，那么演奏时乐师的手指不至于发僵，听众亦可以很安适的去领略音乐的滋味了；第二是希望我们北京市民合理促成市内的电车事业，使交通方便，到那时候音乐会就更容易发达，音乐也就更容易普及了。

民国12年2月21日

（原载《晨报副镌》第1版，1923年3月23日）

介绍赵元任先生的《新诗歌集》

这十年来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，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《新诗歌集》为最有价值。赵先生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，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，精细的头脑，微妙的听觉。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、语言

学的余暇，作出这本 Schbert 派的艺术歌 (art song) 出来，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，更值得我们的崇敬。赵先生这本歌集出世之后，教我们不能不称呼他做“中国的 Schubert”，因为他的歌曲作法，完全是 Schubert 作的一路。这个称号，我想赵先生——不必客气——也要承认的。

我们不但十分欢迎他提倡这种作法，并且希望他在最短期间内，出版他的第二、第三……集，供给我们声乐科做教材之用，因为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，就表情方面看来，中国人当然最适宜是用国语唱本国的歌词。我说这句话，并非不赞成唱外国歌，并非不赞成外国歌词。不过，我们知道在未唱外国歌之前，先要把外国文的发音学得烂熟，把歌词的意思十分了解，唱时方才可以把歌里的精神表现出来。试问今日学生学唱就歌词一方面看来，《新诗歌集》里头一共有十四个歌，其中除掉《秋钟》一首是赵先生的自作词之外，只有十二首半是近人的作品（《瓶花》上半首还是旧诗）。赵先生费了六年的光阴，只选得这十二首半歌词，做他作曲的资料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想大概不出下面两个原因：

第一、近来新诗作品并不少，可惜作诗者未有预备给人家谱曲，所以作成的诗歌，百分的九十九，只宜于读，不宜于歌唱。

第二、新诗作者为保留他的著作权，往往不愿送给作曲者做歌曲的资料。

对于第一点，我希望热心提倡新诗的诗人——指肯贡献他的歌词于音乐界的——对于音乐，尤其是音节方面，稍为注意，将来作成的诗歌，必定容易入谱。作曲者把他的歌词谱成歌曲之后，将来比较可以容易流传，国人所得的印象，比较看读得来的还要深。对

于第二点,我希望新诗人对于作曲者要采用他的作品做歌曲资料时,不必客气的提出具体报酬的要求。这样一来,新歌曲自然可以一天多一天了。

(原载《乐艺》季刊第1卷第1号,1930年4月1日)

为提倡词的解放者进一言

自从曾今可先生近日提倡词的解放以来,这两三个月间有好几位对于这问题发表了些意见。我们把那些意见分析一下,就知道他们的主张不外下列三种:

第一种,主张填词一定要有谱(要照词牌规定的句法、字数作成),但不必拘泥平仄,不必凑额,要活用“死律”,要以新事物新情感入词,并可自由选用现代语。

第二种,亦主张必须要照词牌填词,要讲平仄,但不用古典和比较深奥陈腐的文言,应改用浅近文言或完全用白话。

第三种,主张完全不用旧词牌,不讲平仄,创作新词。

三种主张自然各有一部分的理由,但是同时亦各有一部分的误会。譬如为平民化为容易普及起见,词句当然不能用深奥陈腐的文言,新事物新情感当然可以入词,但是关于“典故”一点亦并非绝对不可用,因为在我国有许多著名的典故,未曾读过书的人,亦常晓得的,只要用典故者谨慎选择便无问题;假如想作成一首专门家的词或艺术的词,那么“典故”和“有艺术价值的词藻”更不能不用了。

至于把旧词牌的句法和字数认作乐谱,或把旧词牌每句规定的平仄认作乐谱,在音乐的立场看来,都

是一种误会。在创作第一个词牌的人,所作第一首词也许用过乐谱,但是这个原来的词谱早已失掉了。后人作词至多不过照足词牌的句数字数与平仄填上,以为如此填法,便有音乐在其中。这是误认其词牌的平仄相间格式为乐谱,因此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无谓的争论。虽然语音有平仄是我国文字的特色,,但某种平仄相间用法(比如仄仄平平平仄仄,平平仄仄仄平平之类),不过是一种谐和的音节,并不是乐谱。有许多悲欢离合不同性质的词句,可以用一种平仄相间法作成,但绝对不能用一种性质的音乐来制谱。因为“音乐”是表现情感的媒介物,同时也可以用来描写自然界现象的。制谱者依照词句的性质作成适当的音乐,不能预先作定一谱,听人家随便填上各种不同性质的词,都可以使用的。作词家假如明白这个道理,就可以不必死守旧词牌作词了。张双红先生在他的《谱的解放》一篇说得好,他说:“……古人当初创造‘词’的时候,他们并没有什么‘谱’来做依据,他们都是创作——自度腔;而后世的人,自己不会创作,只会依着古人的‘谱’来填,依样葫芦的填。这样的相传下去,就变成非依照古人的‘谱’便不得谓之‘词’了。这并不是‘词’的缚人,正是后世的文人在那里作茧自缚!”(中略)他又说:“其实‘词’的得不到解放,也并不是研究‘词’的人少的缘故,这是作‘词’的人没有勇气来创作‘自度腔’的缘故。中国文人的通病,便是把古人看作神圣一般,古人的作品,总以为是不错的。因此都驯服地情愿把自己的活泼的思想言辞,来受古人的‘词’的束缚与限制。从此词人就变了词匠,灵活的‘词’就变成死的‘词’了。”(下略)

张君最末了说的那两句,我们虽然不敢断定个个词人都是词匠,与夫所有后人填的词都是死词,总之

近代词人少却一种创作的勇气，已经是不可讳言。所以我们对于词家，有下列几点的希望：

一、旧词牌既然无曲谱之可考（纵使有曲谱，亦未必适用于填各种性质不同的词），就不必一定要照它的格式填词。与其解放一部分，何如完全创作？

二、既然知道旧词句的平仄格式不是乐谱，也就不必句句照足去填。但有一句声明，在四字以上的词句，所用的字总以平仄相间较合音节，全用平声或全用仄声五字以上的词句，读起来总觉得音节欠和谐。

三、作者如有意创作，而又想容易传播，那么最好多作新歌，一面为文学界开一个新纪元，一面供给作曲家做制谱的对象。

四、至于歌词内容问题，要看歌词的性质和形式如何，不能一定。大约能谱的歌不外下列两大项：

甲、民歌。依它的性质来分类，有儿歌、晨歌、晚歌、宴会歌、各种季节歌、历史歌、军歌、战歌、爱国歌、学生歌、送别歌、挽歌、悲歌、恋歌、旅行歌、嘉礼歌、樵歌、摇船歌、猎歌、渔歌、农歌和工人之歌等等几十种之多；它的形式，为便于群众歌唱，最好照《诗经》国风的体裁，每篇分几章，每章少则几句，多则十几句（但各章的句数最好一律），可是不要句句字数一样，因为象五言排律或七言排律的诗，作起谱来，很难有变化，曲调如无变化，就觉得太单调了。民歌既然是为群众作的，那么歌词的内容，自然以少用典故，多用浅近文言或白话为最相宜。

乙、艺术歌。这名词是由西文 Art song 翻译成的，它的性质不外分抒情和叙事两种，从形式上看来是一篇长歌，可以分开几段，每段句数可以多少不同（非如民歌每章句数必要一律），词句里边除浅近文言外，典故和有艺术价值的词藻，均不妨并用。因为这种歌

词已经属于专门歌的一类，能唱这种歌能看这种歌的人们，都应该有相当的文学知识了。

五、韵的问题。“韵”于歌词音节上极有关系。但一首歌不必用平韵，亦不必限用仄韵，最好是平仄统用（如东、董、送三韵可以并用），并且一首歌可以换韵数次。

以上所举五点，都是我们最希望提倡词的解放诸君采用的。最后还有一言：古语说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”。其实音乐不过只有一半的力量，真要移风易俗，还要等词人诗人多创作新歌出来，给作曲的人去制谱，等制成歌谱之后，你们的歌词更加容易普及，岂不是比单独印专集更有效力吗？我国民气的柔弱不振，自然是因为国民教育没有办好；但是社会上缺乏一种雄壮的歌词和发扬蹈厉的音乐，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些责任，应该由诗人词人和作曲者各担负一半的。所以我极盼望海内诗人词人，尤其盼望提倡新诗和解放旧词诸君一齐起来共同合作，使吾国民气逐渐可以振起，岂不是很愉快吗？

（原载《音》第29至31期合刊，1933年2月。）

音乐的势力（节选）

今天上海市教育局约兄弟到这里来播音演讲，讲题是《音乐的势力》。在未讲这个题目之前，先要把音乐的组织简单地说明一下。

谁都知道音乐是声音的美术或时间的美术，但不是随便一阵叮叮噹噹或大擂大打乱杂无章的声音，都可以叫做音乐，必定要有一定的节奏（rhythm），有相当的和音（harmony）衬托着，配成一种抑扬得宜的曲

调(melody),用适当的章法(即形式),加上各种表情(expression)表现出来,才算是真正的乐曲,才算是音乐。

那么看来音乐不外由“节奏”、“和声”、“曲调”三种原素组成,但是音乐的种类实际上不止三种。第一因为三种原素的配合法甚多,第二因为表情法各曲不同,在合奏的乐曲还有各种乐器的配合法不同,因而作出种种音色出来;尤其是近五百年的西方音乐,不独理论方面愈研究愈精,就是乐曲作法和演奏技术,也变化无穷,登峰造极。近代音乐的种类因此千变万化,无所不有,断非我们中国一千年来没有进步的音乐可以比得上的。

音乐的种类既然很多,并且每种有特殊的性质,有特殊的效用,譬如:

一、温柔恬静的音乐,可以安慰人的脑筋,教人听见容易安眠,摇篮曲就是属于这类;

二、快活的音乐,教人听见精神爽快,小孩听见常常活活泼泼地跳舞起来,这类乐曲西方更多,不能逐一列举;

三、雄壮的音乐,可以鼓起人的勇气,振起人的精神,象军队进行曲就是属于这类;

四、悲哀的音乐,教人听见发生悲感,甚至令人流泪,哀悼进行曲和 Elegie(悲歌)属于这类;

五、忧郁的音乐,听见教人沉闷;

六、喜悦的音乐,听见教人欢喜;

七、优美庄严的音乐,可以洗净人的杂思,提高思想的目标,可以使人的举动变成庄重的态度;

八、怨慕的音乐,可以表现人类怨慕的情绪;

九、音乐又可以治病或减轻病人的痛苦,欧战时各国伤兵医院,多备有特殊的音乐,教伤兵听见,减

少他们的痛苦,在割症时亦有奏着音乐的;

十、近年欧洲法院亦有用音乐改造罪犯心理的试验,就是每天清早于一定的时间演奏一种特别音乐,教犯罪者静听,经过若干时间之后,自己忏悔,立意改过,期满出狱,改邪归正的人很不少。还有用音乐来辅助审判的:某处地方有一件谋杀案,犯人被捕之后,屡次审讯,不肯供认。判官因为找不得证据,又不能立刻判决,于是用音乐助审。把凶手关在一个光线阴暗的房间,半夜从隔壁放一种悲惨的音乐,并且带有一种悲惨的哭声,等这个犯人听过几天之后,再提出审讯,果然被音乐感动,良心发现,逐一供认。可见音乐的力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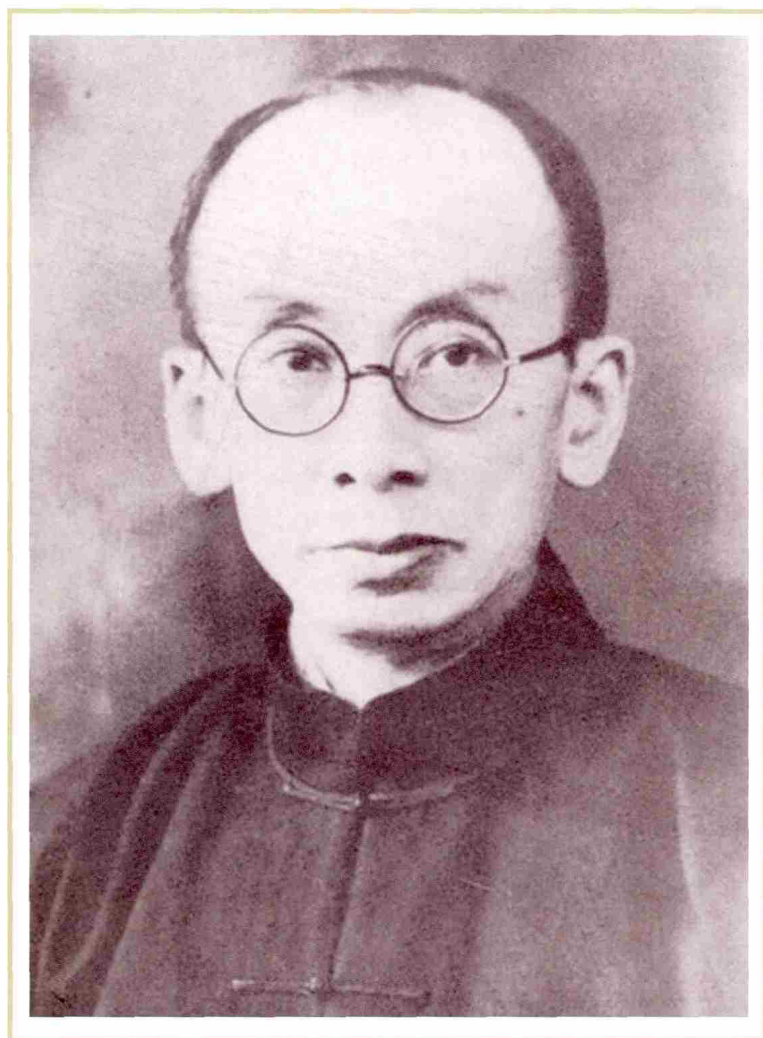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件最明显的,就是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,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。

在西方于举行大会之前后常唱几首“会歌”,这种“会歌”的节奏都很鲜明,歌词亦十分得体,唱过之后增加许多合作的精神。群众受了这种歌曲的影响,好象物体被地球引力吸着,不知不觉要向同一个方向去。军队依着一定的节奏长期步行不觉疲倦,过千过万人唱着军歌一齐冲锋,不觉痛苦,就是这类的实例。

以上所讲的效力有明显的,有潜伏的,有立刻发生效力的,有慢慢才见功效的。笼统可以叫它做“音乐的势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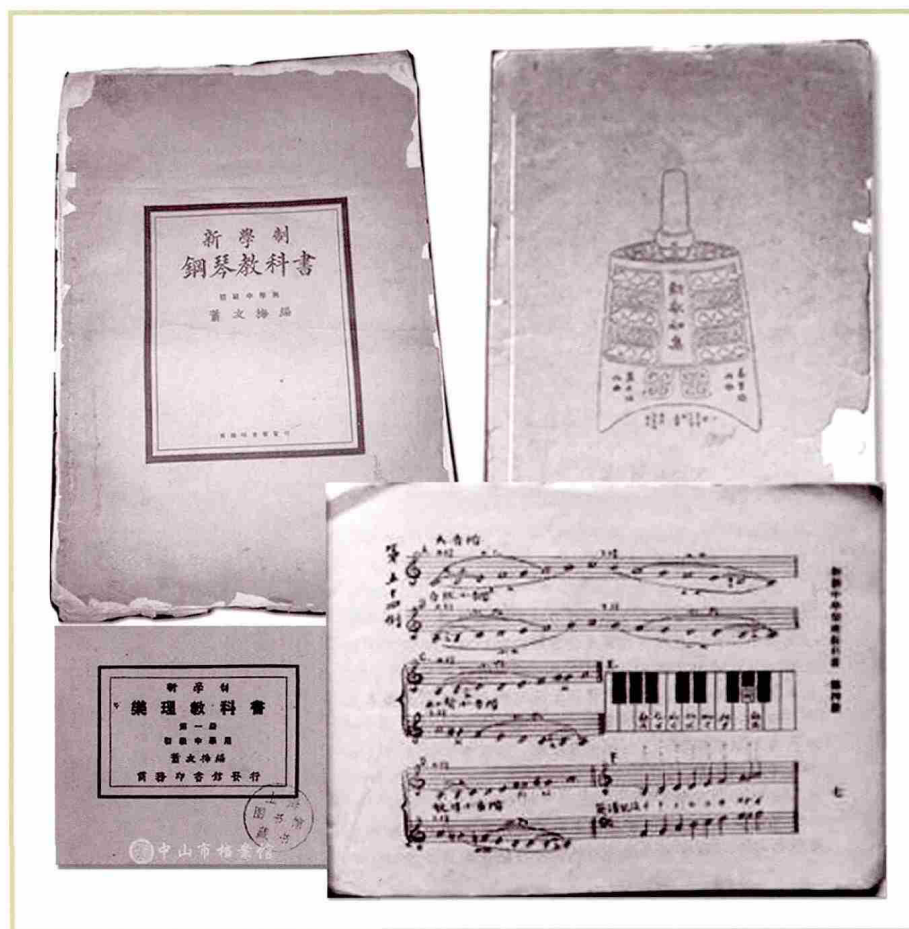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(原载《音乐教育》第2卷第3期,1934年3月31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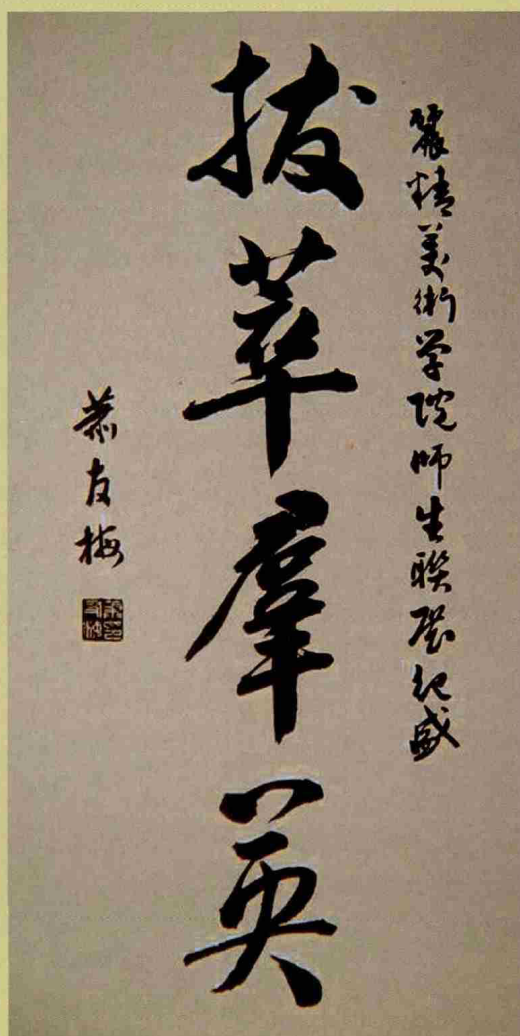


| 粤派批评系列 | 萧友梅 |

萧友梅（1884~1940），字思鹤，又字雪明，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、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、音乐理论家、作曲家；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兴宁里人（今中山石岐区兴宁里）。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——国立音乐院（今上海音乐学院）创始人之一。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


| 蕭友梅 | 作品 |



|萧友梅|手迹|

ISSN 1006-7183

